

战争和军事医学

(1939～1945)

[苏]E·И·斯米尔诺夫 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1982年 北京



战争和军事医学

著者: E. И. 斯米尔诺夫

译者: 罗 宁 缪其宏 李维清 秉卓然

梁建岭 白敬先 周景春 郭志文

校者: 高恩显 罗 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1982年 北京

封面设计：赵明久 高少飞

Е. И. СМИРНОВ
ВОЙНА И ВОЕННАЯ МЕДИЦИНА
1939—1945 ГОД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ДИЦИНА», МОСКВА, 1979 Г.

战争和军事医学

〔苏〕 Е. И. 斯米尔诺夫 著
罗 宁 等译 高愚显 等校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16} 印张：22 1/2 字数：535,000 插图：7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本书发至团卫生队以上卫生单位公阅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苏联总军事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写的回忆录(1979年第2版)。书中记述了作者自1939年至1945年领导苏军卫生勤务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了哈勒欣河战斗、芬兰战斗以及在反对德、日法西斯战争中苏军卫勤保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作者以现代军事医学的观点，深刻分析了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一些重大战役的卫勤部署情况、伤病员的医疗后送情况、防疫情况以及这些卫勤保障措施的优点、缺点和改进的意见。这为我们研究苏军卫生勤务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资料。

为了便于研究各重要战役的卫勤经验，我们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选择7幅战役军事部署图附在本书内，以供参考。

序

《战争和军事医学》这本书不仅是一本作者个人的回忆录，而且也是对伟大卫国战争中卫勤工作的分析和总结。在分析了军事医学专家们的著作，回顾了以往战争中部队医疗保障的历史经验之后，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卫勤组织机构，已经不适应于今天作战的性质。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俄军 1916 年在西南战线实施的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被称为“勃鲁西洛夫突破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德国法西斯的军队拥有坦克及摩托化军、坦克群和海军航空兵，于 1939 年在为期 17 天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次战役中，一举粉碎了波兰的武装力量，又在 1940 年 5 月到 6 月两个月内，粉碎了比利时、荷兰及法国的陆军，并在 45 天内先后连续两次的战略性战役中，粉碎了英国的远征军。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前，苏联红军的卫勤组织机构，虽然比沙皇军队和国内战争时期要明显地好得多，但是按当时的观点来看，仍然与作战的要求不相适应。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在哈勒欣河* 及苏芬战斗中。所以在 1940 年对整个卫勤组织机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使之趋于更加完善。

卫勤组织机构的进一步改善，不仅涉及到伤员医疗后送的组织问题，而且还涉及到部队流行性疾病的预防问题。在伟大卫国战争进行期间，完全证明了那次卫勤组织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1941 年希特勒德国突然进攻苏联，使卫勤工作大大复杂化了，它不但要担负一批伤员的医疗工作，而且还要把有数十万床位的卫戍区医院、军区总医院以及后送医院，从德国法西斯部队即将占领的地区撤退至后方。我记得当时总参谋部的政治委员 Ф. Е. 鲍柯夫就曾向我提出过，要我注意经常到总参谋部来的 Е. И. 斯米尔诺夫，对于前线的战况是否知道得太多了。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我也怀疑过是否有必要让他了解这么多战况。但是当时担任红军总军事卫生部部长的 Е. И. 斯米尔诺夫却为自己证明，他不仅需要了解当前的战况，还要了解近期的战况。听到他谈到关于需要后送的伤员和医院的具体数字，以及为此所需要的卫生列车、军用列车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等，我感到不仅应当保持目前的状况，而且今后应当经常地告诉 Е. И. 斯米尔诺夫关于在战略防御阶段近期内前线战事的变化情况。

在 1941~1942 年红军撤退时把医院由西向东迁，在 1942~1945 年，随着反攻的顺利进行，又把医院再由东向西迁回去，这个调动对于伤病员的救治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以这种方式调动的后送医院总计在 2,000 个以上，约 100 万张床位。

当红军转入反攻阶段以后，卫勤部门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就是预防斑疹伤寒在部队中的流行。几乎在德国法西斯所占领的所有地区，均有斑疹伤寒的猖獗流行，居民中有虱子，有的地方人人都生虱子。不仅红军的卫勤领导部门，而且国防委员会，

* Р. Халхин-Гол 现译为哈拉哈河，过去习惯译为哈勒欣河。哈勒欣河战斗，日军称为诺门罕事件。本书按过去的习惯译法未改。

均对部队的卫生防疫的组织工作极为关注。由于总军事卫生部有关这一问题的建议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以及战前对于卫生防疫机构的改组，使得卫勤部门不但能有力地防止部队中流行病的发生，而且使其能在新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居民中实施各种防病措施。

在伤病员的救治和流行性疾病的预防上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上至总军事卫生部下至师卫生营，均能正确地选拔和善于任用干部。我了解总军事卫生部的领导干部和各科专家们。许多专家的著作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外也是有名的。我在远东工作时，得以较近地认识许多总军事卫生部的领导干部，当时上级派我领导部队在远东战役中与日本关东军作战。他们都精通业务，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对于委托给他们的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我在战争期间，在短时间内曾经指挥过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那儿的卫勤领导干部和各科专家也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医院和师卫生营的各科主任军医，都是由集团军、各野战和前方后送站以及方面军的专家们亲自选拔的。他们经常下师卫生营和医院，在手术台、分类台及病床旁观察医生的工作，知道他们善于做手术，能迅速地、正确地分析判断伤情，并能很好地组织医院内各科室的工作。这些才能对于组织领导医务人员展开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任何一个医院或师卫生营，如果负担太重，即使医疗工作组织得很好，也不可能施行优良的外科治疗和适当的护理。本书作者已正确地指出过这一点。要防止负担太重，关键在于卫勤领导干部要了解战况，特别是集团军和方面军卫勤首长。因为部队和分队卫生减员在数量和时间上的不平衡性，主要是和集团军和方面军战役的性质和特点有关。对于战况不了解、不研究、不是始终一贯地给予关注，就很难指挥成百上千的医疗机构，做到不使一部分医院(师卫生营)负担过重，而另一部分则吃不饱。难怪早在 1942 年末，总军事卫生部就研究并提出对军事医学院的改组方案，其中特别规定了要建立两年制的卫勤指挥系，专门培训卫勤领导干部，以提高其战役、战术卫勤指挥的水平。

我国医务人员在光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 72% 伤员和 90.6% 病员归队。我记得在统帅部工作时，我们在闲暇时，常常谈起没有发生过需要救治和后送伤员的紧急情况，好像不存在伤员一样。当然，我们都十分清楚，不但有伤员而且量很大，所以这样的谈话，常常以对卫勤工作组织得十分完善表示赞赏而告终。

医务工作者的英雄业绩，他们鞠躬尽瘁的精神，豪迈的劳动，为了救治受伤指战员不惜冒牺牲个人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正是我军的指战员保卫了祖国的尊严和自由，把欧洲的许多民族从法西斯奴役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医务人员的这些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

作者的这本书是为医生们写的。它一定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我想，其他读者，特别是苏军军官和将军们也会对本书感到兴趣，对于他们来说，读一读这本书，特别是本书的第三部分，将是十分有益的。

苏联元帅 A. M. 华西列夫斯基

(罗 宁 译)

作 者 的 话

《战争和军事医学》这本书已经写了好几年，写作前并无事先拟订好的计划，写作计划是后来才有的。医生，医助，护士，卫生员，和卫生担架员，这些称呼在战争中并不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的作用和意义，在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史无前例地提高了，因为这次战争曾经把几千万人卷了进来。

本书作者所积极参与的许多事件，都和苏联人民所遭遇的灾难和极端的痛苦有关，不论他们是生活在撤退时的我军作战地区，或者是生活在新从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这些事件还和指战员们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有关，他们受过重伤，当他们一想到明天的命运时，常常不能克制自己。“战争”这个词，对于未直接参加过战争的人，或者虽然参加了，但是只了解局部情况的人来说，主要是和亲人及朋友的牺牲有关，这些情况以往历次战争均无例外。但是伤亡的规模这样大（数百万），暂时生活在被占领地区的人这么多，则是本次战争所独有的现象。

关于伟大卫国战争，在艺术性、历史性及军事回忆录性的作品里，已经把一切表述得淋漓尽致了。读者们从这些作品中，已经了解到苏维埃祖国保卫者的英雄业绩，和所经受的不可想象的痛苦和考验。然而在这场神圣战争中，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经过数千万人的痛苦磨练，将更加光辉夺目。苏联医务人员由于职业上的责任，由于受到列宁的党的召唤，和良心的驱使，勇敢地挑起了与伤病员所受到的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痛苦作斗争的重担。他们和战场上、营团救护所、师卫生营及医院里的死亡现象作过英勇的斗争，为了挽救伤员的生命而竭尽全力，不计时间和劳累，为了用高昂的精神战胜抑郁状态，用健康战胜伤病，他们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他们用言语来医治重伤员精神上的抑郁状态，用医学知识和技能战胜斑疹伤寒的流行，这种病在新解放地区的居民中极为猖獗。

为了对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战胜敌人起过重大作用的医务工作者的豪迈劳动表示敬意，作者谨以本书来表达自己深切感激的心情。

本书第二版比第一版作了较大的改动。特别是补充了一些信件和发言稿，它们都是针对某一问题而写成的，已为许多参战人员所熟知，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新增加了3章，专门谈到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进攻战，东喀尔巴阡和布达佩斯进攻战役，以及巴拉顿防御战役等的卫勤保障问题。

（罗 宁 译）

目 录

序

作者的话

第一篇 在伟大考验的前夕

意料不到的任命.....	(3)
指路明星.....	(13)
哈勒欣河战斗和组织问题.....	(29)
国家后方各医院专科化的开端.....	(39)
苏芬冲突.....	(43)
会议及其小结.....	(54)
迫切的组织和方法指导问题.....	(68)

第二篇 战争与保健

医疗网和医学科研中心.....	(73)
医务干部及其训练.....	(80)
医药供应.....	(88)
医院由西向东的撤退及其返迁工作.....	(94)
卫生机构和管理机构的组建.....	(112)
部队卫生防疫.....	(145)

第三篇 各战略性战役中伤病员的医疗与后送

莫斯科会战.....	(171)
斯大林格勒会战.....	(181)
库尔斯克会战.....	(188)
苏军在列宁格勒及诺夫哥罗德城下的进攻.....	(196)
白俄罗斯战役.....	(208)
利沃夫-桑多梅希战役	(230)
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解放	(243)
东喀尔巴阡战役.....	(261)
布达佩斯进攻战役和巴拉顿防御战役.....	(269)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286)
柏林战役.....	(310)
满洲战役.....	(332)
结束语.....	(341)

第一篇

在伟大考验的前夕



意料不到的任命

1939年5月我被召到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来到了莫斯科。接见我的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集团军级政治工作人员E. A. 夏坚柯，他对我的工作经历很感兴趣，详细询问了我现在做什么。我向他汇报了一年来我作为某军区卫勤首长的活动，特别注意了动员工作，并向他介绍了该军区的几个主要卫戍区。与此同时，我还认真地研究了该军区所属医院和部队医疗预防工作的开展情况和内容。我指出，医院里(特别是卫戍区医院)的内外科医生们，无法获得医治战时军人中多见而平时少见的复杂疾病的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疾病在平时主要见于居民中，或军人家属的中年及老年人，或见于军队的职工，但是这些人按照现行规定是不允许在军队医院治病的。

在谈话结束时夏坚柯说，我应当准备接受新的任务。他避而不谈我的新工作的准确地点和职务，只提出让我明天再到总干部部来一趟。

第二天我又到了总干部部。人们告诉我党中央的工作人员要接见我，并告知了房间号码和接见的时间。经过到党中央谈话，我才第一次被告知，要任命我当红军军事卫生部部长。这个任命我没有料到，因为感到担负如此重大负责的工作自己不是那块料。我7年前才从军事医学院毕业，只在部队当了3年多团军医，其中有一年半是当坦克营的军医，又在摩托化旅代理过军医的职务，并有2年在炮兵教练团工作。没有在步兵这个“田野皇后”各部队和分队工作的最必需的经验。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有2年多是在基洛夫军事医学院领导过一个学员班。

我把对新的任命的一切担心之点都向谈话的对方说了。但对方回答说，跟他说“没有用”，并建议我去找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然后他就给夏坚柯通了电话，并把我们谈话的内容简短地告诉了他。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命令我立即到他那儿去。

第二次与E. A. 夏坚柯的谈话，语调就不像第一次那样平和了。我主要是听。关于我自己说的不是当部长的料的说法并未引起注意。和我一起被召到莫斯科来的还有一些有经验的军医——伊凡·阿列克山大洛维奇·克留斯和彼德·米洛诺维奇·儒拉夫列夫。为什么3个候选人中要选中我，夏坚柯向我做过解释。原因就在于我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当然也注意到了我的鉴定书。我曾于1938年1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夜校部，这一点对我一生起了重大作用。毕业后我立即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卫生部部长。如果说在任命前的那几次谈话中，军事学院的学历并不突出，那么现在大概可以说，我当时的反对是注定无济于事的了。

在得到允许谈谈我对这次任命的不同看法以后，我请求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注意这样一件事：即对我的履历中记载着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过业这件事，可以得出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认为，这是证明我适于担任红军军事卫生部长的主要依据。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在军事学院得到的那些知识，一方面扩大了自己在军事方面的视野，另一方面更使我确认，不论从医疗实践经验，还是从军事医学知识来说，都不适于担任这个职务。

我解释说，在我们祖国以往的历次战争中，军事方面最不完备的部门是军事医学。但是我的话并未产生作用。E. A. 夏坚柯强调指出，对我的任命是由国防人民委员部部长、苏联元帅K. E. 伏罗希洛夫决定的，我们无权讨论这一问题。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我被告知返回列宁格勒，准备接受任务并等候正式任命。

从副部长办公室出来以后我陷入了沉思，心里充满疑虑，感到惶恐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光，在我国的东部和西部离边界线不远的地方明显地闪烁着。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久前（1938年7~8月）在矛头指向我国的哈勒欣河军事挑衅中遭到失败以后，时常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在西方，希特勒德国于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然后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一年之后，在西方列强的默许下，又占领了捷克的其他地区。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我的忧虑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到，一旦打起仗来，作为工农红军军事卫生部部长，对于千百万伤病员的命运所肩负的极其重大的责任。我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军的卫生减员数为900万人。也知道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卫生减员数同样很大。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及美国，坦克和汽车的数量大大增加，这就使得步兵实现了机动，战斗机、自动射击武器、轻型滑膛炮和有来复线的重炮均大大发展了。表1中所列举的数字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在部队中服役的亲身经验使我确信，我尊敬那些在国内战争中建立过功勋的指挥员们，他们对于交给他们的任务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指挥员，既能严格要求，而又爱护备至。但是他们对于卫勤保障工作当前所面临的任务的看法却不对，从好的方面来说，他们是用内战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从坏的方面来说，他们是以和平时期对待病员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的。

为此我想谈谈我在部队服役最初几年所遇到的几件事。

1932年春末，我作为第11步兵师第33步兵团的见习军医，被叫到工农红军军事卫生部，由那里又被派往驻在纳罗佛敏斯克的部队。该部队就是卡林诺夫摩托化旅。我和一组军医共同研究了坦克部队的情况和战时坦克的作用。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坦克，它们的机动性、流动性和火力，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们对于“田野皇后”——步兵的支援如此之大，可以想象出来。我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坦克有过一些了解，但他们的速度都不快。现在的坦克，比起国内战争末期作为重型武器的“轻便双马战车”来，在各方面要好得多。

该旅为我们创造了一切条件，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的、威力强大的坦克部队。在该旅见习期满以后，我就回到了列宁格勒。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在那里当过见习军医的那个团，这时正驻扎在杰茨科耶谢洛。在杰茨科耶谢洛我找到了团部。但没有找到一个熟悉的卫勤首长及军政首长。人们建议我去找团参谋长H. E. 阿历克塞耶夫。进入接待室以后，我请求副官向团参谋长（当时代理团长职务）报告我的到来，我立即被接见了。握手寒暄之后，我被允许坐下，只听见他说：“高山纵然阻隔，人们总得相逢”。团参谋长问我记得他吗？我回答说：有一次我和骑兵团团长在乌鲁平斯克营相遇，他也姓阿历克塞耶夫。但由于见面时间极短暂，而且是在1930年，所以记不清他的面貌了。我记忆中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他剃一个光头，胸前戴着红旗勋章。我的对话者立即提醒我，骑兵团团长和他是一个人。我感到很窘，并请求原谅，未能认出他就是团长。而我在这个团见习过，并参加过演习，记得每次演习完了，总是来一个骑马冲锋。当时我们这些见习军医，只要会骑马，能在疾驰中驾驭奔马，才

表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 年)各主要大国军队技术装备的增长情况⁽¹⁾

国 别	大 炮				迫 击 炮				重 机 枪				步 枪				载 重 汽 车				作 战 飞 机			
	轻 型	重 型	重 型	战 争 型	战 争	战 争	战 争	机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步 枪
	战 开 时	战 结 时	战 结 时	战 开 时	战 结 时	战 结 时	战 开 时	开 始 时	东 时 ⁽²⁾	战 结 时	东 时 ⁽²⁾	战 结 时	东 时 ⁽²⁾	战 结 时	东 时 ⁽²⁾	战 结 时	东 时 ⁽²⁾	战 结 时	东 时 ⁽²⁾	战 结 时	东 时 ⁽²⁾	战 结 时	东 时 ⁽²⁾	
德 国	5,500	15,000	2.7	2,000	10,000	5	—	30,000	—	—	—	—	—	70	(4)	55,000	—	300	15,000	50				
英 国	1,500	7,000	4.6	500	4,000	8	—	4,000	2,000	50,000	25	—	—	3,000	807	56,700	70	272	22,000	81				
意大利	1,500	6,000	4.0	200	5,000	25	—	8,000	(4)	30,000	—	—	—	—	1,600	26,000	16	143	2,700	19				
美 国	550	6,000	10.9	400	4,500	11.2	—	(4)	1,500	118,000	79	—	—	1,000	(4)	28,000	—	65	6,000	92				
俄 国	7,112	7,265	很少	795	2,560	3.2	—	—	4,152	23,800	5.7	—	—	—	—	7,000	—	150	1,000	6.7				
法 国	4,500	10,000	2.2	300	7,500	25	—	3,000	5,000	30,000	6	—	—	4,000	6,000	80,000	13	560	17,000	30				
共 计	20,602	51,265	2.5	4,105	33,500	8	—	45,000	12,652	251,800	20	—	—	8,070	8,407	253,700	30	1,490	63,700	43.0				
其中协 约 国	15,162	36,265	2.4	2,195	23,560	11	—	15,000	12,652	251,800	20	—	—	8,000	8,407	198,700	23,611,180	48,700	40.0					

(1) 见《世界战争的统计数字》一书, 第 34、45 页, 国立军事图书出版社, 莫斯科, 1934 年。

(2) 在前线和后方;

(3) 包括教练机和后备飞机;

(4) 统计数字较少。

能被团的指挥员看成是经过了特种训练，而被接纳为骑兵团的一名平等成员。在这里，军医会骑马，被看得比具备医学知识更为重要。因此，像我这样新来的人，就成为了骑兵连及团的指挥员的注意中心。所以作为团长的尼基伏·叶弗列莫维奇·阿历克塞耶夫就记住了我，两年之后还能认出我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谈话过程中我被告知，我已被任命为第一坦克营军医，并兼第32摩托化旅的卫勤领导。该旅隶属第11摩托化军，后者又是在我见习期间由第11步兵师改编而成。

过了不久，旅长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波德希瓦洛夫走过来。他的纽扣上有一个菱形章。身体很结实，圆圆的脸，不论外表或举止都像一个军人。性格豪爽。正像人们所说的，对他一眼就能看明白。在旅里人们都怕他，但都尊敬他。他是一个助理军医的儿子，当过教师，说话很有条理。他见到我，后来与我的谈话，以及我在旅里做的工作，使他产生了对我的好感。后来我就成了他的私人医生。他是一个视野开阔、有军事素养的人，他接受了军长卡斯扬·阿历克山德洛维奇·柴柯夫斯基交代的任务，要准备在第11摩托化军成立1周年（1933）大会上做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从基辅来的、由军长A. H. 鲍利先柯率领的第45摩托化军代表团。安东·尼古拉耶维奇·鲍利先柯是1918年入党党的老党员，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曾经两次荣获红旗勋章。

K. A. 柴柯夫斯基是贵族出身，曾经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他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准尉。1918年加入工农红军。1919年入党。由于在国内战争中立过战功而得到过红旗勋章。

为什么要让B. I. 波德希瓦洛夫来做报告，我很难于解释。我只知道他很了解情况，讲得很生动，并有自我批评精神。而且他的自我批评不是套话。在他的报告中没有“即将改正”，“要加把油”，“把耽误的时间补起来”这些字眼。他谈到了我们究竟学会了什么东西，在已有的知识和作为一个坦克手必须具备的知识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听众们屏住了呼吸聆听他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最后结束讲话时所说的大意，即我们大多数人现在只不过是马车夫，只有少数人可以称得起是汽车司机。马车夫距离汽车司机很远，距离坦克手就更远了。很好地了解并掌握汽车驾驶技术，就可以大大提高步兵的机动性，如步枪-机枪营那样。坦克驾驶员要想成为坦克手，仅仅知道坦克的机械构造或者仅仅会驾驶是不够的。他应该成为坦克的一名可靠的乘员。在战斗中他的责任不仅仅是了解坦克性能和善于驾驶它。坦克与运输车辆及牵引车不同，它是一个战车。坦克上的几名乘员是一个整体，在战斗中要协调动作，它要就地迅速地辨别方位，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其速度、机动性和火力，这些都是坦克作为战车的特点。然而报告人说，做到这些还不算达到要求。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上述一切，仅仅是坦克部队第一阶段的训练任务。一辆坦克就像一个战士一样，不能要求一辆坦克在战场上做到需要一个坦克营、一个坦克旅甚至一个坦克军才能做到的事情，而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隆重庆祝坦克军成立1周年。

摩托化军的建立是为了把战术性成果发展成为战役性的。坦克进入突破口以后，不仅可以防止溃退的敌人占领后方边沿地段，而且可以防止敌人预备队的反攻，打得它措手不及、无力还手。而突然性、动作迅速、果断则可以保证胜利。为此，报告人继续说道，就应该掌握驾驭坦克部队的艺术，它一方面要求坦克具有很大的通过能力，很高的机动性、活动性和强大的火力，另一方面，就要求善于选择最主要的打击目标，毁坏了这个目标就破坏了敌人的防线。不允许为了解决战术问题而把一个军的部队或分队投入战斗，除非这个打击目标虽非计划之内，但对于解决全军主要战斗任务十分重要。报告人在结束时说，我们目前虽然

尚未掌握这个艺术，但是应该掌握，而且一定会掌握。然而时间不等人，不能白白浪费掉。

我对于这个报告的内容就感到十分惊奇，更不用说它的形式了，口气是那么坚决、果断，使你无从怀疑其正确性。我习惯于在一些庄严的大会上，听到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意义的报告。而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另外一种提出问题的方法。我当时还不知道 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昂达维洛夫及 A. I. 叶果洛夫的著作。在卡利诺夫斯基旅的训练班里，向我们简单地谈到了坦克的 3 项任务，即：对步兵的直接支援，对步兵的远距离支援，和远程运动。我尽可能地多听、多写。我到旅长的宿舍，不仅有机会和他谈到防病治病问题，这是他感到有兴趣的，而且有一次我还大胆地谈到了坦克问题。我似乎说过，不同用途的坦克，首先应该明确规定其任务，其次，还要求坦克的构造有其特点。在卡利诺夫斯基旅，我未能找到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明确答案。第一个问题是：对步兵进行远距离支援的坦克如何完成其任务？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到对步兵进行直接支援及远程运动的坦克的战术技术特点。

对步兵进行直接支援的坦克，应该和步兵一起突破敌人防线。它们的装甲应能经受住敌人团的炮火甚至师的炮火袭击。对于它们来说，速度就不如装甲和火力那么重要了。进行远程运动的坦克，则应有很大的活动性、机动性和火力。它们不是用于突破防线，而是远离步兵，位于作战的开阔地带。

B. I. 波德希瓦洛夫回答我说：根据 1928 年出版的《使用坦克的临时法规》，没有什么远距离支援步兵的坦克群，用于直接支援步兵和远程运动的坦克在构造上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他家里，在一种无拘束的情况下，消除了精神上的紧张状态，B. I. 波德希瓦洛夫向我谈到了他的经历。他于 1915 年在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就被征召入伍，开始当列兵，4 个月以后就进了阿历克山大洛夫军事学校当了士官生，到了离开沙皇军队时，他是中尉营长。从 1918 年 2 月起他从事校外教育工作。从 1918 年 9 月起他开始在红军中服役。1919 年入党。国内战争结束时当过步兵团长。有一次夜间他到士兵宿舍去，连队值班员不顾战士正在睡觉，却下达口令：“起床，立正！”这样他动手打了值班员，为此他被告到法院，受到严厉的惩罚，并被开除出党。一年多以后又恢复团长职务。1937 年被重新吸收入党。在军区里他有步兵专家的名声。但有一次当他不在团里时，全团考核射击成绩不好。由于他性格耿直，对于缺点不能容忍，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这样就导致他一方面严厉地批评了下级，一方面也做了自我批评。每当分析这类情况时，他总是细心地体察实情。在严厉批评犯错误的人时，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相反地，他把造成过失的原因多半归于自己。但是他批评人的方式，使旁人感到难堪，这对于他的威信有一定影响。

我对他还是很尊敬的，觉得他和别的人不一样，别的人似乎性格较稳定，安详，但是对于喜怒哀乐的事并不上心。不能认为后者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自私自利。不是的，个人的幸福和成就对于别的人来说不是无关的。问题在于他们表露得如何，如何反映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

要正确无误地评价一个人，他的求实精神，特别是他权衡赞成和反对的能力，是不那么简单和容易的。而在军事上和军事医学上这些品质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健康人把生命交给了指挥员，而伤员则把生命交给了卫勤首长。有时为了事业而甘冒生命危险。要想了解谁具备这种品质是很困难的，因为许多人的品质并不表露出来。

在一次谈话中，B. I. 波德希瓦洛夫对我说，说我对于坦克及其战斗性能感到兴趣，但是却说我未能把在卡林诺夫斯基旅得到的有关坦克部队卫勤保障的知识告诉他。我回答说，

我得到的知识不完全，只限于两个比较专门的、狭小的问题：如何把受伤的坦克手从毁坏的坦克里救出来，以及如何对脱离步兵的、在敌人后方活动的坦克部队伤员进行后送。旅的卫勤首长，我们主要指导者，热心地为我们讲解了这个简单的道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军事医学理论家，他们能够根据坦克和飞机对于整个战略战术所引起的变化，从而相应地改变其卫勤保障的方法。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B. И. 波德希瓦洛夫指出，在军事上首先是发展如何使人致伤的理论和实践，只是后来才研究如何预防伤亡问题。正如俗话所说，秋菊春桃，物各有时。如果考虑到，日常诊疗工作和阅读医学文献，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时治疗伤员的成败，那么军事医学部门落后一点倒也关系不大。因为卫勤部门要解决的任务的复杂和困难程度，比起纯军事的任务来要小得多。我只同意对方的部分观点，我并且向他指出 Л. Н. 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一段话，那是巴格拉齐昂公爵写给阿列克切耶夫的一封怒气冲天的信，怒斥巴克莱不愿坚守斯摩棱斯克。信中主要说的是拿破仑已经钻进了口袋，他将损失一半兵力但仍然拿不下斯摩棱斯克。信中指出，仅仅损失 4,000 名士兵和军官不能作为不坚守斯摩棱斯克的理由。讲到伤亡问题，巴格拉齐昂写道：“……就是伤亡数字比这大 10 倍，那又怎么样？这是战争！而敌人伤亡得更多……”应该强调指出，作者在巴格拉齐昂写的信中加上最后几句话，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伤亡数要大 3 倍，超过 12,000 人，其中半数是火器伤和挫伤。我不是无目的地谈到 1812 年的那次卫国战争。武装斗争的手段没有什么本质上新的东西。巴格拉齐昂部队的伤亡数字为 15,000 名步兵和骑兵，都是 8 月 16~17 日这两天在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发生的，这证明卫勤保障工作的复杂性。在 35 个小时保卫战中，15,000 名参战人员中共发生 6,000 名伤员，数字很大。这么大的伤亡说起来容易，但要施行初步救护、医生救治及优良救治可困难啦。需要多少大车才能把他们从斯摩棱斯克运出来？如果每辆大车拉 4 名伤员，那就要 1,500 辆！而为了施行内外科治疗，又需要多少临时陆军医院呢？如果每个医院有 200 个床位，那就要 30 所医院。

这道算术题不太复杂，也不那么简单。了解了这一点，即使有 1,500 辆大车和 30 个 200 张床位的医院，也不一定能把全部伤员从斯摩棱斯克运出来。部队已经退却了将近两个月了，准备和斯摩棱斯克的第 1 军汇合以后，为坚守该城而战斗。对于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来说，命令他们从 17 日夜里到 18 日清晨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是心里不乐意的。他们还准备和敌人战斗。但这对于施行卫勤保障却有直接影响。不论是前线军医总监或者是医院督察（他们均从属于值班参谋长），都没有立即撤退伤员的根据。他们不怕把伤员留给敌人。因为有指挥官和他们的司令部管这些伤员。由此可见，在作战条件下，要想把纯军事上的事情和卫勤部门的事情分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根据不成文法律，指挥官应是其部属的父母官。但是这还不是反对把军事和卫勤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还应当想一想《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另一段描述。当皮埃尔·别祖霍夫于 8 月 25 日凌晨，由莫扎斯克出发到作战部队去的途中，遇见一位他认识的医生，他恰好是作战部队卫勤领导之一。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我不能把这段对话一字不漏地转告对方，但是谈到了主要内容。皮埃尔·别祖霍夫询问：我方部队的前沿阵地在那里。医生回答说：这不关他的事。这就是卫勤指挥员对于军事医学的理解。这纯粹是对军事医学的无知！但却种无知是真实情况，不是小说作者艺术上的虚构。医生一方面说：他不知道部队前沿在那里，但却告诉皮埃尔：他可以从塔塔林诺沃村的山岗上看到阵地前沿。当皮埃尔请求医生带他去前沿时，他却说他要到军长那儿去，并立即和盘托出他的苦衷：明天将

发生战斗，估计约有 2 万名伤员，但是担架、床位、医生、医助严重不足，还少 6 千人的。有 1 万辆马车，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这本小说中所引用的数字都是有文献作依据的，这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卫勤组织工作的复杂性，以及为部队作战培训卫勤保障人员的艰巨性。在斯摩棱斯克和鲍洛津战役中，卫勤保障人员训练不足，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什么新式武器，卫勤部门不了解其杀伤性能。对于军事部门和卫勤部门来说，所要种的菜的品种是一样的，但是在卫勤部门所用的种子以及种植和管理的方法不好。所以，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不能不同意这样一点：即仅仅知道平时地方的那套卫生保健办法是不够的。我讲这番话，也不仅仅是从事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及时接收伤员，并从各方面对为祖国的尊严和自由而战斗的指挥员进行很好的照顾，这件事本身就很重。但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表明的，俄军当时的伤员不下数百万。当时德军及法军伤员也有数百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其卫勤组织及工作范围来说，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历次战争有显著的不同。特别是作战部队的卫勤保障。作战部队需要经过治疗恢复战斗能力的指战员来补充，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特点之一。

我向对方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军的减员问题，但必须指出，所引用的统计数字是很不精确的。如果加上高加索战线，那么总减员数不算病员就超过 800 万。其中有 400 万以上是火器伤、挫伤、烧伤和化学毒剂伤。必须指出在死亡数中有 20 万人是属于下落不明。其中绝大多数是重伤员，未能被卫生担架员找到。如果考虑到一般均是在夜间从战场上收集伤员，而且俄军在这次战争中退却多于进攻，那么这样的推测就更加合理了。

如果考虑到在部队医疗救护所因伤及因化学毒剂中毒而死亡的人数共计 24,418 人，而在治疗机构死亡的人数为 43 万人，那就可以说在沙俄军队中，医疗救治的组织工作乃至治疗工作本身都是很糟糕的。这样，伤病员死亡数加上下落不明人数将是 654,418 人。如果再加上 400 万作战受伤的人中还有 44 万(11%)死亡，那么总共因作战及巩固后方面死亡的人数约 100 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我又举了因各种疾病即非战斗减员而遣散回家的人数。我手头有 1912~1913 年的统计资料。战争年代发病率显然高于平时，因此从军队中遣散回家的百分比也要高一些。1913 年 1,000 名军人中发病数：军官 521 人，士兵 383 人。1912 年治疗结果：遣散回家者 12.1%，死者 3.7%。如果我们估计得没有什么大的错误的话，那么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军总人数平均为 425 万人，各年卫生减员数按 1912 年的 15% 的数字计算。沙皇军队共打了 3 年半的仗。在此期间因病在治疗机构治疗的有 500 万人。可以粗略地估计每年发病人数为 140 万人，因此作战部队每年减员 21 万人。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再加上遣散回家和因伤死亡数，若每年战斗减员数中仅有 60% 归队率，则总减员数 1,142,860 人中共有 457,144 人不能归队。那么沙皇作战部队每年就要减少 667,144 名军官和士兵。造成这么庞大的不可思议的数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1) 卫勤组织不适合于战争的性质；(2) 卫勤领导干部对于战争没有准备，而平时的保健工作知识对战时无用；(3) 平时不注意培养卫生人员适应作战部队工作；(4) 未能把受伤指战员重新归队作为补充作战部队人力的重要来源。如果要在战争进行期间来消除上述原因，那付出的代价就太高了。

我举出的这些论据说服了对方。他只要我解释一下在谈话开始时，为什么我说只部分地同意他的观点。我很乐意回答他这个问题。坦克对于卫生减员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因素。因为在坦克出现以前很久，就已用大炮及机关枪装备了部队。一个士兵受伤，不论他是被坦克里